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WORLD CLASSICS ON EUR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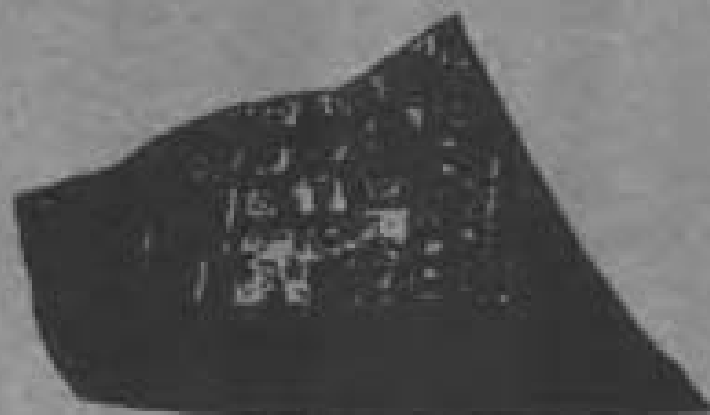


隋唐帝国与东亚

[日] 堀敏一 著 韩昇 编
韩昇 刘建英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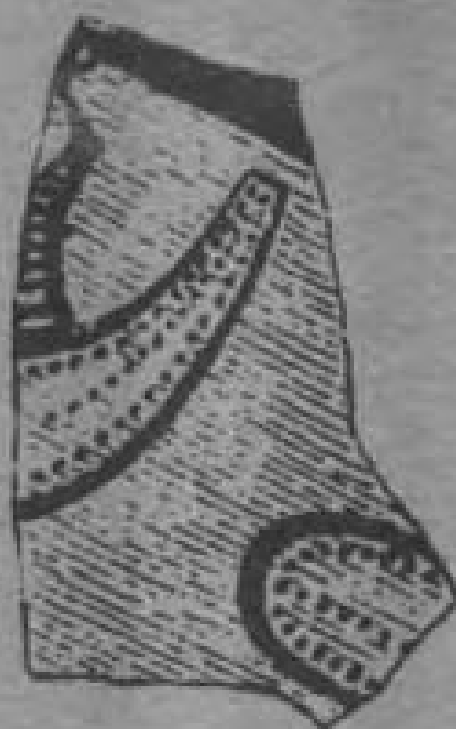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WORLD CLASSICS ON EUR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日] 堀敏一 著 韩 昇 编
韩 昇 刘建英 译

隋唐帝国与东亚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帝国与东亚/(日)堀敏一著;韩昇编;韩昇,刘建英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ISBN 7-222-03343-2

I. 隋... II. ①堀...②韩... III. 中外关系—国际
关系史—东亚—研究—隋唐时代 IV. D82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6506 号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隋唐帝国与东亚

著 者 [日]堀敏一

编 者 韩 昇

译 者 韩 昇 刘建英

总 策 划 林 祥 胡廷武

主 编 余太山

副 主 编 张 立

责任编辑 赵石定

封面设计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出版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mm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40 千字

印 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7-222-03343-2/K·312

定 价 19.00 元

出 版 说 明

一、本丛书所谓“欧亚”主要指内陆欧亚(Eurasia),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二、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上有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对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我国作为内陆亚细亚的大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特别是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朝鲜半岛、日本、乃至西欧、北非等地)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尤其是核心地带)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

四、本丛书旨在将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有关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著作介绍给中国学者。凡属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范畴的通史、专史、研究专著、专题论集或资料集,于我国内陆欧亚学界有重大参考价值者,均在收辑之列。学术性名著是入选本丛书的主要标准。

译者的话

一

我喜欢读堀敏一先生的文章,不仅是为其渊博的学识和缜密的论证所吸引,还因为他善于将深奥的理论和复杂的事件剖析清楚,娓娓道来,令人茅塞顿开。而且,堀先生的著作广征博引,融会贯通,一册在手,则学界成果了然于胸。所以,堀先生近年几部关于东亚世界的著作问世以来,我已反复通读数遍。

堀先生是日本的中国古代史学界巨擘,早就为中国学者所熟知。他1924年出生于日本风景秀丽的静冈县,上小学那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件”。在血腥残忍的战争年代里,他度过了求学的青春岁月。经历过战争的劫难和战败的彷徨,目睹了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勃兴,作为战后第一代史学家,堀先生奋起于清算帝国主义史学的第一线,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因为此,他始终坚持以联系的观点,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局,去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批判了中国社会停滞论,撰写了《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古代的身分制》等宏篇巨帙,给日本史学界以莫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堀先生也反对抹煞东亚社会的特点,认为东亚世界存在着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并以此影响和汇入世界历史的洪流之中。广阔的视野,宏大的规模,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精确把握,以及对历史进程的动态性缜密研究,无不表现出其史学研究的特色。

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堀敏一先生的名字是比较熟悉的。

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就出版过我们翻译的《均田制研究》一书,给当时热烈展开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土地制度史的研究,增添了一点新意。当时,我国学术界刚刚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挣扎着走了出来,堀先生的著作,确实令人感到一种清新的启发,所以,译著才发售,旋即告罄,连我自己都没能买到。以后,堀先生的论文,又一再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因此,史学界颇知堀先生是中国古代史的大家。然而,我们不一定了解,日本的中国史学家在东亚世界的研究上也用功甚勤,成果颇丰,对其国内的国史研究多有启发,他们经常起到将国别史与世界史或者区域文明史相沟通的桥梁作用。且不论他们在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有多大,他们这种治学的路径与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二

1993年以来,堀敏一先生先后出版了《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岩波书店,1993年)、《律令制与东亚世界》(汲古书院,1994年)和《东亚世界中的古代日本》(研文出版,1998年)三本讨论东亚世界的专著。第一本,我曾写过长篇书评,发表于《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后面两本,则未见国内有所介绍。因此,余太山先生主持这套丛书翻译时,我就想到从这三部著作中选取一本来翻译。经过与著作权人及出版社反复协商,同时也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多了解堀先生对东亚世界的研究,决定以《东亚世界中的古代日本》一书为基础,增选《律令制与东亚世界》中的个别篇章,由我重新编排,结为《隋唐帝国与东亚》一集,翻译出版。此安排得到堀敏一先生的允许与授权,也获得相关出版社的认可和支
持,谨此致谢。

本书由《绪论 古代东亚世界的基本结构》、《上篇 隋唐帝国与东亚》和《下篇 东亚世界的人口流动与制度文化的传播》组成。《绪论》提纲挈领地介绍东亚世界的形成及其主要问题;《上篇》具

体探讨隋唐帝国与东亚关系的变迁,阐述该时期东亚世界国际政治关系的确立以及国际交往的性质与特点;《下篇》则研究东亚世界中的人口流动、律令制度的传播和在唐新罗人对东亚交通的贡献这样三个个案。全书由表及里,从对东亚世界的全局性把握到具有根本意义的国家间政治秩序的形成,进而深入到东亚世界内部,对一些不一定显眼却至关重要的个案进行讨论,使人们对东亚世界的了解更加深入、全面、丰富。也就是说,全书采取由宏观到微观,从政治关系到具体的社会、制度、文化关系,层层深入的结构安排。堀敏一先生特地为这本新书写了一篇短小精悍的《前言》,进一步阐述他对研究东亚世界的基本立场,由此可以了解作者研究东亚世界的理论与方法的出发点。

《上篇》由四章组成:1. 隋代东亚的国际关系;2. 唐初的日唐关系与东亚国际局势;3. 日本与隋唐王朝间的国书;4. 渤海与日本之间的国书。

自从汉帝国崩溃之后,中国的东亚国际政治中心的权威地位逐步丧失,到五胡十六国时代,中原的汉族王朝被推翻,代之而起的是过去受压抑的胡族,以往以汉朝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关系秩序崩溃了。这种情况一方面促成周边民族的独立,例如在朝鲜半岛,韩族攻陷魏晋王朝在当地的郡县,建立起各自独立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而日本大约也在此时完成由邪马台国到大和朝廷的演变,基本实现国内统一。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中心的丧失,也导致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实力为基础的竞争,带来无休止的战争和唯权力崇拜。

隋朝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内分裂状态,重新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继隋而起的唐朝,更是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帝国,物质与精神文明均达到鼎盛。隋唐帝国的繁荣,不是由中国孤立地实现的,以隋唐为主导的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各民族、地区、国家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源源涌入,是实现唐朝盛世的基本因素。因

此,重建以隋唐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便成为保持国际交往与繁荣的前提,为此,隋唐两代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上篇前两章,就是对这种努力的具体阐述,说明不同于汉朝的新的东亚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在东亚,隋唐帝国重建国际政治秩序所面临的一大阻力,来自高句丽王国。高句丽崛起于晋末,因鲜卑族进入中原造成其对东北地区控制力下降的形势,向西扩张,控制了辽河以东的广大区域。由于高句丽地区曾经有四百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的郡县,中国文化的根基很深,水平也很高,中国人对其有很深的亲切感。高句丽向西扩张的势头虽然在北魏时被遏制住了,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渊源关系,高句丽同中国国内政治势力仍有较深联系,我曾经在日本发表的《隋と高句麗の国際政治關係をめぐって》(《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汲古书院,1995年)以及在国内发表的《隋朝与高句丽关系的演变》(《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一文中,以北齐末年的高宝宁借助高句丽抗拒统一的事例,说明高句丽问题对中国内政的深刻影响。至于在国际上高句丽公然抗拒隋唐王朝,将使得隋唐两代建立国际政治关系秩序的努力付诸东流。因此,朝鲜问题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安全,同时也关系到国际安全环境能否建立,无论哪个方面,对于隋唐王朝都是至关重要的。更何况隋唐两代的皇帝都雄心勃勃,充满自负。因此,朝鲜问题必须置于国际环境中进行考察,而这是整个东亚国际关系的基础。作者前两章用颇长篇幅论述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形成的过程,有着很深的道理。

那么,隋唐两代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秩序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呢?这种关系具有规范性的表现,就是国家间交换的国书。因此,国书问题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或者是枝节末叶的考证。作者为此用了两章的篇幅,比较细致地探讨中国和日本、朝鲜、突厥的国书,还专章讨论高句丽灭亡之后,唐朝与渤海之间、日本与渤海

之间的国书,目的在于研究东亚世界内国家关系的演变。

应该说,以上都是日本史学界关于东亚世界研究的主要课题,讨论深入而热烈,堀先生从中国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所提出的见解(例如,他指出隋唐对突厥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而日本同隋唐的关系应从隋唐外交大局出发来定位等等)对于日本的国史学界深有启发。

三

堀先生提出的问题,对于中国史学界也很有启发意义。

我国学界在对外关系的研究上,欠缺颇多。至于超越中外关系的视角,把中国与世界作为一个内在深深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来开展研究,更不多见。1942年,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专门写了《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这篇经典力作,为我们作了一个研究范例。然而,在陈先生影响巨深的论文中,这篇论文引起的反响可能是最小的,说明我们对此问题尚未提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仍然喜欢孤立地研究中国历史。

多年前,我在《唐研究》第二卷发表的一篇书评论文中写道:

在我国,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处于两条平行线上,缺乏紧密的联系,造成各自颇为明显的局限性。就以迄今出版的中国史著作而言,中外关系与内政研究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那些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的民族国家,是否应列入中国史研究的范畴?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刻板的界限是否应该打破?有关中外关系的论述不应继续作为附属性的点缀,中国史的研究再不能划地为牢了。

只要不从全局的观点、世界的观点去认识开放的隋唐时代,许多问题将像在深山中转圈圈,不可能获得正确的解释。就以上述隋唐征伐高句丽的个案来说,一般的教科书常以隋炀帝好大喜功来打发,而翻案论者也局限于在隋唐与高句丽两国关系上进行分

析,或以领土问题为第一要素,或以自卫反击为理由,都没能切中其要。至于具体的研究,如上述的国书问题,偶然有几篇论文,却也就国书谈国书,甚至以为有无文书皆可。孤立进行研究的局限性历历在目。

堀先生在本书《前言》中特地强调: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是,我的研究并不是单纯的日中关系史,或日中交流史。我想把包括中国、朝鲜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视作具有一定的结构的历史世界来把握。

这种视角、理论和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在历史上,中国强大繁荣、蓬勃向上的王朝,是与世界脉络相通、命运相连的。那种密切的联系,经常超出我们的想象。过于遥远的往世且不去追述,就汉武帝通西域而言,中国一直致力于同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开辟西域和“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不能仅仅从国防安全和疆域扩张的范围内去理解。通过内陆欧亚,中国与地中海文明、印度文明以及北方草原文明建立了广泛而颇具规模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惠及世界,也给中国带来新的思想、新的刺激。哪怕在“五胡十六国”的动乱年代,众多胡族涌入中原,在血与火的破坏中,也携来新的风气习俗,甚至是民族的混血融合。由此造就了兼包并蓄、气势恢弘的唐朝盛世。这段历史,不能不从世界性的全局视野加以把握。北朝隋唐许多制度文化,乃至二十世纪大量考古新发现,用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完全说明,必须综合运用其他地区文明才能解释圆满。也就是说,这些制度文化,是各种文明交融的结果。

唐朝因与世界融为一片而引领风骚,同样也因为失去主导国际关系的能力而逐渐衰退。一般认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安史之乱”,实际上,这种衰退从唐朝在西域战败时已经开始。天宝十年(751),是值得注意的一年。这一年,唐朝先在西域遭到大食(阿拉伯)军的重创,高仙芝统率的三万部众几乎全军覆没,西域

这片中西交通的战略要地,逐渐脱离唐朝的控制;不久,唐朝再惨败于东方,安禄山数万大军被契丹歼灭。这些失败标志着唐朝的向外张力已经走向衰落,而此衰落加速了国内各种矛盾爆发的进程,引发了一系列内乱。国际上的失败导致帝国的衰退,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显而易见,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是互为因果的。因此,研究历史的时候,国际性全局观点不可或缺,尤其是研究汉唐时代的东亚。在这里,我想再次呼吁加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用“世界中的中国”的角度,以国际性全局视野来观察中国历史,把国际与国内问题有机联系在一起,从各个层面研究外来文明与本地文明之间的传播、吸收、融合及其演变,以及相应的环境与条件,既要从中国看世界,也要从世界看中国;既要研究中国自身,也要研究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作用。

四

本书的《下篇》有三章,亦即:1. 魏晋时期的人口流动——日本的外国移民问题的背景;2. 中国律令制度在东亚的传播;3. 在唐新罗人的活动与日唐交通。

在讲日本史的时候,常常可以听到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说法。其实,这是一种视野短浅、心胸狭隘且不正确的观点。在历史上,日本有过非常开放的年代,也有过大量接受外来移民的时期,尤其在其国家形成、国土统一的时期,也就是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如前所述,中国在国际的中心地位丧失,曾促使各国国家独立,而对于相对落后的东亚民族,建构国家的样板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发达的文化与制度。而这些高度文明结晶的东西,并不是听人说说就可以如法炮制的魔术。实际上,这种文化移植是非常复杂、曲折、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其中,至关重要的是通过人的迁徙来实现文化的移植。日本人类学的研究,无论

是体质人类学、还是近年兴起的人类基因分析,乃至传统的考古发掘、文献考证,都证明从弥生文化时代至九世纪,有大量的外来移民迁徙到日本。日本学者埴原和郎先生估计其人数,高达百万。以后仍然有大陆人不断迁徙到日本,但已是个别现象,对日本民族的构成不造成影响。

我们知道,从汉武帝以后数百年间,朝鲜为中国的郡县,大量的汉人生活居住于此。五胡十六国时代,汉族政权被胡族所推翻,朝鲜地区的乐浪、带方郡也被攻陷,在民族斗争中,汉人不得不离开中心城市,另觅生路。而且,山东、河北及辽东地区的汉族有相当部分也逃入朝鲜,这些集团性流民,与朝鲜地区的汉人会合,逐步南下,最后纷纷迁徙到日本。

正是这种集团性移民,带来了大陆的技术文化、组织制度等各种知识,并在日本新形成的大陆社会中保存发扬,为日本所采纳吸收,实现大陆文明在日本的移植。因此,日本古代大陆移民问题,是东亚文明研究的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堀先生专门设章谈人口流动,显示了对此课题的重视。

制度文明的移植,集中体现于法律上。第六章专门研究唐律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以及各国对唐律的修正,揭示了各国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指出社会发展的差异性法律体系多样性变化的基础。本章虽然不长,但论述深刻,揭示了东亚世界内部的社会差异性与同一性,相当精彩。

最后一章论述的是在唐新罗人在东亚各国交流上的作用,以及新罗、唐朝海上商业活动,两国海商势力的消长,揭示由古代社会官方占绝对多数的国家间交流向中世社会以民间为主的交往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交流从以政治关系为主向经济关系居主导地位的转变,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外在表现形式。从此,东亚世界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

五

东亚世界的理论,是战后日本史学界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日本开始迈向近代化的明治时代(1868~1912年),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有名的“脱亚入欧”论。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日本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拉开了同亚洲其他国家的距离。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所谓日本社会进步性与中国社会停滞性的问题,风靡学界。这种论调认为,日本取得成功的奥秘在于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走出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因此,日本不仅能够“脱亚入欧”,而且也必须“脱亚入欧”。其理论上的进一步引申,便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理论。在此思潮的影响下,战前的日本学者轻视甚至歧视亚洲,不仅是理论上和文化上的歧视,还演变为种族歧视,已不得割断一切与亚洲的联系。

二战以后,日本史学界对无视史实、否定日本传统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影响下培育起来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批判。中国社会是否封闭停滞?日本与东亚是否属于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文明区域等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不仅反映在日本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的讨论上,也反映在东亚理论上。

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和堀敏一先生对东亚世界的探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他们都认为,日本的发展是以中国和朝鲜的发展为前提而取得的。西嶋先生从汉字、儒教、律令制和佛教等四个方面论证,在古代,东亚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内在联系紧密的自律完结的世界,它通过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册封而构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因此,册封不仅是东亚世界外在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是其内在联系的强有力纽带。针对当时日本史学界而提出的“册封体制论”,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

西嶋先生曾专门研究过“二十等爵”问题,是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专家。“册封体制论”实际上是其对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

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延伸。其理论建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无论赞同与否,都影响着当代日本对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研究。但是,西嶋理论的结构分析方法过于强调外在形式(如册封等)和国家间的政治从属关系,缺乏从周边国家的立场进行的研究侧面,在比较中外文化时着重于求同的一面,在运用于具体历史的研究上显得僵硬,甚至有些削足适履。

堀敏一先生的“羁縻体制论”,就是针对西嶋理论的不足而提出的。他既吸收了西嶋理论的合理成分,同时又注重中国对外关系的主导思想与基本原则,并且从各国接受中国对外关系体制的内在需要进行研究,在强调东亚世界相互联系的大前提下,注意各国社会形态和接受中国文化的阶段性差异,从而更加客观、深刻、全面地揭示了东亚世界的联系性与多样性。而且,他还十分注意内政与外交的互动关系,例如对中国州府与羁縻州的比较、唐朝对境内外国人的各种优待措施的研究,无不使我们从内政方面找到对外政策的根源,看到对外关系消长对内政的影响,从而加深了对唐朝世界帝国性质的认识。其对日本一些带有某种程度民族主义情结的观点的批判,发人深思。

不用说,堀敏一先生的这本著作,便是在这种东亚史观下撰就的。实际上,日本史学界长足的进步,颇与其对世界宏观的把握相关。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0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就曾说过,日本史学研究显著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历史学家的视野则广阔得多。……日本在国际政治中很活跃,这就使日本历史学家习惯于从国际格局中而不是从孤立的地位上来看待日本历史”。

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日本对古代中国、以及自身在东亚世界的定位等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着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中国古代王朝在处理同周边民族或国家的关系时,其基本的理论依据是儒家的“华夷观念”。它既有排外的一面,又具有强烈的融合的

一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始终把夷狄作为构成天下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所谓“天下为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王者之制”。《荀子·儒效篇》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华夷之别既非出自“天性”,亦非不可转移,关键在于习礼乐与否。也就是说,区分华夷的最高标准是文化。

从战国到汉代,《春秋》公羊学派将“天下为一”和华夷观念发展为系统的政治、历史理论,进一步发挥文化界定的思想,甚至认为如果失诸礼,则“中国亦新夷狄也”。何休注:“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乱,莫肯救,君臣上下坏败,开新有夷狄之行。”这样,中国和夷狄的绝对区别消失了,种族标准被否定了,留下来的只有文化差别。由此发展出以“德化”统一天下的理论,即“用夏变夷”。这种“德化”并不是要同化或消灭种族,而是在承认世界广泛性基础上对各种异民族的包容,用文化的统一去达成政治的统一。《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十一月”条记载:

《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侯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内诸侯而外夷狄”所表现的已不是种族的歧视,而是“德化”的进程。

不难看出,儒家学说中的华夷观念虽有种族歧视的一面,但它更强调的是文化的认同,并最终以文化统一来克服种族歧视。多起源的中国文明、各族共存的客观世界、中国文明对周边民族国家的先进性和由此产生的文化自信心,形成由客观的民族差别到华夷观念乃至天下一统的不同认识发展,构成不同的理论层次。中国对外关系的排他性和包容性均能在此得到充分的解释,中国各种对外政策措施能够圆融灵活地根据同时代的变迁而演进完善,亦得益于此。对于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对外政策,自有其深厚的理论和现实基础,表现出相当长期的一贯性。

在日本,华夷观念被称作“中华思想”。这是一个既不严密又

极不科学的称法,不仅令人迷惑不解,而且也容易造成新的民族歧视。在当代中国,对“中华”最一般的解释,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第1481页:“古代称黄河流域一带为中华,是汉族最初兴起的地方,后来也借指中国。”当代中国人在使用“中华”一词时,并没有妄自尊大和民族歧视的意识。可是,在日本通行的词典,如最新出版的《广辞苑》第四版第1662页将“中华”解释为:“在中国,汉民族对周围文化落后的各民族(称作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以世界中央的文化国家的自我意识所作的自称。”这种没有时代观念的解释,是极易引起误解的。从本书的论述来看,堀先生对华夷观念的分析,是客观公正的,许多地方颇具真知灼见,只是未加批判地沿用日本习惯的“中华思想”一词,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由于这个问题牵涉到许多理论认识的方面,所以我们在翻译时,基本不作改动,而在此对其词义略加说明。

用世界的观点研究东亚,用联系的方法研究国史,是本书在理论方法上给我们的另一启示。中国曾经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古代中国并不是封闭停滞的、完全小农经济的国家。今天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重新迈向世界,我们的史学研究也必须走出国门,与世界学术研究接轨,占据我们应有的位置。

前 言

韩昇先生将我近年来关于东亚世界问题所写的文章介绍到中国,深表谢忱!

首先,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是,我的研究并不是单纯的日中关系史,或日中交流史。我想把包括中国、朝鲜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视作具有一定的结构的历史世界来把握。

我想用这种眼光来研究东亚,主要的理由有两条:第一,东亚是一个包含我的祖国日本在内的世界。只要读一读最早记载日本情况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就可明了,脱离同亚洲大陆的密切关系,日本文明的开端就无从谈起。而且,这个时代,在汉帝国瓦解之后,不仅是日本,东亚的各个民族勃然兴起,开始活跃起来。由于这个缘故,中国进入了魏晋南北朝分裂时代。

日本国家形成之初,其样板只能是中国。因此,倭国五王向中国江南的王朝派遣使节,以后还派遣了遣隋使和遣唐使,主要是为了学习中国的国家统治方式。当然,派遣使节的不只是日本,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朝鲜三国、新罗、渤海、五凉王国、土谷浑、吐蕃、柔然和突厥,都向中国朝贡。由此可以看出东亚各国、各族共同的趋势。不能将日本的动向单纯从日中或日朝的两国间的交往来考察,而必须放到东亚世界整体中去把握,道理就在于此。

有人认为,基于遣唐使之类的国家间交往,代表着古代日中关系的最盛时代。我对此抱有疑问。本书言及唐代后期在唐新罗人的商业活动,主要依靠日本僧人圆仁的记述来描绘。从中可以了解到,商人、僧侣等民间活动,实为唐末以后东亚各个时代的特征。